

# 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花钿首饰研究

## Study of the Floral Jewelry of Dunhuang Mogaoku Murals in the Tang Dynasty

田 华 Tian Hua

内容摘要：本文以敦煌壁画唐代经变画中汉人佩戴的“花钿”作为研究的对象。以盛唐时期莫高窟壁画130窟中出现的人物形象作为研究线索，并将同时期经变画中人物及其它相关图画资料、出土文物作为旁证进行论述，对“花钿”的称谓、形制、服饰搭配进行分析研究，结合当时唐人的着衣特点，将其佩戴的可行性加以分析，并对其制作材料、工艺、佩戴的社会意义进行进一步界定。

关键词：唐代、敦煌莫高窟壁画、花钿、首饰、服饰搭配

\*本文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科研基金项目

注释：

[1]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第299页。

[2] 《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77页。

[3] 《全唐诗》卷六九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60，第797页。

[4]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879页。

[5] [6] 《花间集》卷十，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8，第201页。

[7] 《新唐书》卷二十四，中华书局，北京，1975，第523页。

[8] 《全唐诗》卷二十八，中华书局，北京，1960，第410页。

参考文献：

[1] 《李其琼临摹敦煌壁画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 霍然：《唐代美学思潮》，吉林出版社，长春，1997。

[3] 段文杰：“敦煌莫高窟唐代艺术中的服饰资料”，《中国敦煌

### 一、“花钿”定义

《说文·金部》：“钿，金华（花）也”。<sup>[1]</sup>

这是对于“钿”的最早解释。钿，是古代妇女常用的一种首饰，通常以金、银、珠翠或宝石制成，佩戴时插于发髻之上，因其形制多成花状，又称“花钿”。古代所谓的“花钿”有两种不同的定义及形制：

1. 面饰，此种“花钿”用一种牛鱼鳔制成的呵胶贴于额上的，卸妆时用热水敷软即可揭下。属于贴式花钿的一种，白居易《长恨歌》中“花钿委地无人收”就是指的那种面饰，属于妆容的一种，用于贴额的花钿，又有“面花”之称。

2. 簪首，属于头饰、首饰的范畴。在本文中笔者研究的“花钿”是在其作为首饰的概念上展开。

### 二、唐代的“花钿”

唐代社会繁荣、开放，不管从服饰还是社会习俗都能体现出来。由于战乱频繁、民族和亲、民族杂居，从而促使各民族间加强了文化交流，对于服装、配饰都有一定的影响。在唐代，发式造型及发饰品的种类颇为丰富，其中发饰品包括有发簪、步摇、栉具、簪花、花钿，发饰品的设计与制作和当时整个社会华丽的着装风格形成一致。

唐朝的妇女，颇喜插戴“花钿”，这个时期的花钿大多以金制成，故名“金钿”。唐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美人红妆色正艳，侧重高髻插金钿。”<sup>[2]</sup> 韦庄《叹落花》诗：“西子去时遗笑靥，谢娥行处落金钿。”<sup>[3]</sup> 沈亚之《秦梦》诗：“金钿坠芳草香绣满春风”均此。也有称其“金花”者，如韩愈《奉和武相公镇蜀时勇时咏使宅韦

太尉所养孔雀》诗：“翠角高独耸，金华（花）焕相差。”<sup>[4]</sup> 可见当时佩戴花钿十分风靡。

### 三、唐代“花钿”的形制、佩戴方式及服饰搭配艺术

#### 1. “花钿”的形制及纹饰

现存“花钿”实物，以晋代出土为早，此时花钿的形制有两种：一种背后装一短柄，犹如发簪，使用时直接插于发髻。另一种是制成薄片状，背后无短柄，但在其花蕊或花中心的部位留有小孔，使用时另以簪钗之类的饰物固定，可在簪头部分另作设计。出土的“花钿”有金银两种材质，而出土的位置大都在女性人骨头部，显然是被用作头饰。

唐代的“花钿”在晋六朝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外形设计还是工艺加工，都比前代精致。如，在陕西西安东郊的一座隋舍利墓中，共出土金钿两件，其外形、大小各不相同：一件做圆形薄片状，直径3厘米，外圈有细小的金粟，内有菱形的花瓣十二个，中有圆孔出土时小孔略残，另一件较此为小，约2.5厘米，外形为八瓣朵形，又套叠八个小花瓣。每个小花瓣中都镶有宝石，现已无存；花蕊的部分也留有小孔。

陕西西安韩森寨雷宋氏墓出土的金钿更有特点：以五色花瓣组成一朵小花，再以八朵相同的小花组成一朵大花；在花朵的旁边，另用细小的金珠连缀成花叶，在花蕊的中部，还镶嵌一只展翅欲飞的小鸟，给人以花团锦簇之感。掐丝、金银珠经常是用焊接的方法依附在器物的表面，焊接成形成为唐代金银器必不可少的制作方法之一。

上述花钿的中心部位，大多开有小孔。

佩戴时须用簪钗固定于发上。在唐代，也有将花钿和发簪制成一体的，即在花钿背后伸出簪梁，使用时将簪梁插入发内，花钿即留在发外。四川成都罗家展地区出土的铜钿，即是这种形式，出土时共有三件，器形相似，顶部成圆弧形，外圈有波浪纹的边饰，簪梁为圆柱体。三件铜钿中，两件为素面，一面饰有团花纹，长约8.8厘米，圆顶直径约3.2厘米。

以上所述花钿在设计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用正面律构成纹饰，从正面顶部的角度来表现花形，使饰物产生均齐、对称的装饰效果。河南洛阳孟津西山头唐墓出土的陶俑，作舞女形象，在她的发髻正中，即插有一枚这样的花钿。

唐代“花钿”的主要花纹装饰可概括为团花、折枝花、忍冬花结、小簇花、串枝花、雀压枝花、折枝团花、绶带花等，而每种花型又皆可细分出细节设计不一的花型，故唐代花钿在设计形式上十分多样。但从出土的实物来看，唐代妇女所饰的花钿，多数作团花、折枝花形，唐人《麟趾图》中的贵妇，即插这种折枝花形花钿。广州的皇帝岗唐墓出土的一件金钿，也属于这种类型。整件金钿由四枝花朵组成，外加花叶。钿身薄如纸片，上有凹凸的花纹，花叶之间的空隙部位全部被镂空，既便于穿系固结，又增强了装饰效果。

#### 2. 花钿材质

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唐时期妇女的花钿，以金钿、银钿等材料制成者为多，除此之外，还有用鸟羽为饰者，名为“翠钿”。唐李珣《西溪子》词：“金缕翠钿浮动，妆罢小窗圆梦”<sup>[5]</sup>；五代的薛昭蕴《女冠词》：“求先去也，翠钿金篦尽舍。”<sup>[6]</sup> 都

是说的此物。翠钿是在金钿的基础上加工而成,其制作方法是在金钿上粘上鸟羽,由于大部分的鸟羽多翠绿色为美,选择者较多,故被称为“翠钿”。新疆的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出土的《弈棋仕女图》中的贵妇,头上的饰物即为“翠钿”。敦煌莫高窟晚唐第9窟《戏鹦鹉女供养人》(图1)中妇人头梳抛家髻,发髻上饰有一枚翠绿色花钿,花状,由中心发散,共12瓣,从壁画上看,形制颇似翠钿,在发髻的两鬓处还饰有穗状的花钿,两鬓花钿所在位置及形制对称,与头顶一枚花钿色彩相同。此妇人所戴翠钿和其披帛色彩统一,搭配得当,从大量的服饰资料说明在唐代许多妇人已具有前卫时尚的首饰和服装搭配意识。由此可见,翠钿在唐代也颇受欢迎,这种材质的花钿一直延续到宋代。

除了“翠钿”之外,在“金钿”的基础上再镶嵌宝石或直接以宝石为原料制成花钿者,则称为“宝钿”。“宝钿”也是唐代金珠焊缀工艺的代表物之一。《新唐书·舆服制》:“内命妇受册、从蚕、朝会,外命妇嫁及受册、从蚕、大朝会,……两博鬓饰以宝钿。”<sup>[7]</sup>“宝钿”及贵重首饰在唐代非常盛行,使得社会上奢靡之风严重,尤其是在贵族阶层,出现了争奇斗富的现象。而为了整治这种现象,唐肃宗时期,曾将“宝钿”列入禁用之物,但从实情来看成效不大。直到明代末年,仍有不少的妇女佩戴、迷恋这种装饰品。

### 3. 佩戴“花钿”的人物身份及服饰“混搭”艺术

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宽袖对襟衫、长裙、披帛。这也是中晚唐之际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如朝参、礼见及出嫁等。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旧唐书·舆服志》:“内外命妇服花钿,施两博鬓,宝钿饰也,翟衣青质,罗为之,绣为雉,编次于衣及裳,重为九等而下。第一品花钿九树,宝钿准花数,以下准此也。翟九等。第二品花钿八数,翟八等。第三品花钿七数,翟七等。第四品花钿六数,翟六等。第五品花钿五数,翟五等。六品以下无,



以后各朝亦沿用此制”。据史籍记载来看,唐代妇女着礼服时,所插的花钿多寡有别,视身份而定。

在唐代也有簪鲜花的记载。唐谢偃《踏歌词》:“风带书还卷,簪花举复低。”<sup>[8]</sup>敦煌莫高窟130窟(图2)都督夫人雍容华贵,身量超过真人,都督夫人身着织花石榴红裙,肩披多层轻绡薄縠披帛,绿色锦带长垂胸前,云髻高耸,发上簪花,钗梳插饰发间,并有“花钿”插于髻上。花钿有重要的装饰作用,笔者认为都督夫人头上绿叶、红花状的饰物与周围环境中的植物色彩协调统一,故认为是鲜花,而非一定是绢花或花钿。

都督夫人身后率领二女:“女十一娘”、“女十三娘”和九名婢女。身后二女或着绿裙,或穿黄裙;一梳回鹘髻,一戴凤冠;朱白衫上,分别披有多层丝绢披帛。二人皆带篋具、鲜花,戴凤冠者还饰有花钿,形制上颇似宝钿。

都督夫人身后的画中人物身量递减,显示出一派等级森严的气氛。身后九名侍婢各依年龄,或捧花、或执壶或持扇、或擎布施的奁奩,侍立于夫人身后,虽均着男装,绾结出不同发式,有双垂髻者,髻上系红色丝带,无饰花。有三者以透额罗帕首,其中一者头饰一朵鲜花,一者饰两朵,另一者则只戴透额罗,并无佩戴花饰。左上方一者梳娥髻,头饰一朵鲜花。中间一少女,头上插有四朵小型的花饰。张萱《捣练图》中的妇女,也作这样的装扮,在发髻的四周,插以五枚小型的花钿。敦煌莫高窟第9窟《少女与童子》中少女梳双髻,髻上饰有两枚花钿,形制精美。此



种佩戴方式还见于莫高窟156窟《宋氏出行图》中侍女所饰,其中侍女佩戴的花钿形制、种类均不一致。

因此,从130窟壁画中佩戴的首饰及数量可看出人物的身份。身份高贵者所插花钿枚数多、材质昂贵,而身份低微者如仕女者则佩戴花钿数量较少或不佩戴。

唐代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民族和亲、与西域贸易的往来使得整个社会群体的着装方式发生了变化,从130窟壁画中的妇人的搭配来看,涉及当今一时尚用语“混搭艺术”。“混搭主义”(Mix & Match)是指近年来流行于时尚界的一个专用的术语。它混合了时尚与经典、奢靡与质朴、繁琐与简洁之间的界限,由个人化的意识、审美感,自由搭配混合了不同时空、文化、风格、阶层的元素,用一种“非标准”的特点来彰显自己个人化的风格。用这种任意搭配的“混搭美学”来形容唐代妇人的服饰搭配艺术一点也不为过。

敦煌莫高窟130窟唐代壁画中,妇女着男装、女装者皆饰花钿或花朵,首饰和发式、服饰的搭配也并不相同,大量的服饰资料都体现出这种特点。另外,唐代女性着男装(胡服)并饰首饰、帽等装饰品的十分多见。女性着装中性化服饰并饰有夸张、个性的饰品,以展示自我个性,这种风格在唐代颇为流行,成为一种风尚。当今的服饰搭配中“混搭风格”颇为风靡,可见服饰时尚是周期性反复轮回的产物,服饰、时尚、饰品受到社会环境及思潮的影响。

田 华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应用艺术设计学院

1. 敦煌莫高窟第9窟《戏鹦鹉女供养人》晚唐
2. 敦煌莫高窟130窟《都督夫人礼佛图》

学百年文库·艺术卷》,甘肃文化出版社,兰州,1999,第339-365页。

[4] 敦煌研究所,江苏美术出版社:《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九窟第一二窟(晚唐)》江苏美术出版社,南京,1994。

[5] 张永祥:《中国乾陵》,陕西旅游出版社,西安,2001。

[6] 申秦雁、范淑英:《懿德太子墓壁画》,文物出版社,北京,2002。

[7] 张铭治、范淑英:《章怀太子墓壁画》,文物出版社,北京,2002。

[8] 史苇湘:《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兰州,2002。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北京,1985。

[10] 高春明、周汛:《中国古代妇女妆饰》,学林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上海,1997。

[11]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9。